

旷世善缘忆无锡唐氏

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前后,华北、西北八省发生了一场史上罕见的大灾荒,地处中原豫、晋、陕三省交界处的河南陕州地区(今三门峡市陕县一带)更是灾情深重。远在千里之外的无锡工商实业家紧急组织赈灾队奔赴灾区,全力拯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,上演了一出出殊为感人的义赈故事。这个慈善大剧曾经尘封了半个多世纪,随着近年来有关文物的重现,才使人们知道了无锡工商人士极不平凡的慈善往事,无锡唐氏家族的旷世善缘也随之浮出水面。

无锡善人赈灾豫西

据当时报纸报道,河南陕州地区连年大旱,继而暴发蝗灾,赤地千里。又逢军阀混战,土匪横行,战火纷飞,民不聊生,几十万灾民挣扎在生死线上。洛阳、开封等城市聚集流离失所、衣食无着的灾民约10万人,而陕县、灵宝等地因交通阻塞,更有数百万人坐困待毙。豫西大灾情传到无锡,立即引起工商实业家的高度关注。连续多年组织跨地区赈灾的无锡民间慈善机构立即作出反应,一方面派专人前往灾区调查灾情,一方面由无锡中国银行堆栈经理施襄臣主持,统筹策划募捐赈灾方案,向工商实业家和社会各界募集赈灾资金,组织力量分赴陕州各处设粥厂救灾。

整个陕州赈灾前后持续三个年头,自1929年初夏起,无锡慈善团体先后派出数批人员,在陕县南关、灵宝、渑池等地设立粥厂数十处,面向灾民施赈。1930年秋冬,针对蝗灾肆虐,无锡慈善家又一次组织陕州救灾,遇到中原大战战火逼近才被迫撤回。等到冬天战事稍稍缓和,施赈者未等过年再度前往。艰苦的救灾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夏熟接上民食方告结束。

豫西大赈灾,是无锡工商实业家跨地区赈灾中规模最大、效果最显著、影响最广泛的一次。整个救灾活动救活的灾民数以十万计,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。

施赈者之一过智修,为申新三厂供应科会计,他忠厚朴实,待人和善,又能吃苦耐劳,随队到达陕州后,他不知疲倦地忙碌在救灾第一线。又至函谷关和灵宝,开设粥厂,直到“五月熏风大麦黄”,救济队陆续撤回。过智修和何维周负责处理扫尾事宜,晚归了个把月。因为积年劳累,灾区缺医少药,患病不能及时治疗调养,1931年初夏当他最后撤出灵宝时,军阀混战又一次阻断了陕州至郑州的铁路,过智修在滞留洛阳旅店中急病去世,年仅37岁。

当时,“无锡善人”不但拿出钱粮救助百姓,还派申新三厂棉花采办张润夫采购防疫药施放,并筹资重修文化古迹。施襄臣在赈灾之余,慕名前去祭祀陕州著名的召公祠时,发现该祠“墙倾栋摧,上无盖障”,毁于战火,于是“醴资鸠工”,重新修葺。事毕,请近代著名学者、时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的唐文治撰写《陕州召公甘棠庙碑》。文中不仅记叙了陕州赈灾之事,而且倡导陕州人民发扬召公敬德保民精神,不贪财物,不作盗贼,努力耕作,再歌甘棠。陕县所立的“无锡各善团春赈纪念碑”碑文载曰:“陕人感之,乃于古召公祠建功德林,以崇德报功也”。

唐氏兄弟力倡义赈

关于这段赈灾历史,《陕州召公甘棠庙碑》记:“1930年秋,无锡施永成膺溥仁慈善会唐滋镇(即唐保谦)、圻镇(即唐申

伯)、华堂等推选,往赈于陕。”《陕县志》也有着同样的记载。

这次陕州赈灾,一个名叫“溥仁慈善会”团体在其间出力最多,作用最大,而“溥仁慈善会”正是由唐保谦、唐申伯、孙鹤卿等实业家倡导设立的。

说起唐家的灾赈行为,今天的人们已经知晓甚少。实际上,从晚清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唐家的灾赈行为有着集中和连续的表现,甚至形成家族效应,两个房支约三代人均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
唐锡晋在其中建树尤多,独擅殊荣。他连年奔波于南北义赈,利用所能支配的血缘关系、地缘关系以及职业关系为义赈营造了一张颇为快捷有效的关系网络,赢得了义赈的最高荣誉。《清史稿》是这样说的:“锡晋治赈,自乙亥(1875)至辛亥(1911)凡三十有七年,其赈地为行省八:山西、河南、江苏、山东以及陕西、湖南,东至吉林,西至甘肃;其赈款过百万以上。义赈之远且久,无过锡晋。歿后,众思其德,受赈各省咸请立祠祀之。”《毗陵唐氏家谱》中对于唐锡晋的义赈成就有更进一步的记载:“所振灾区为行省者八。山西、河南、江苏、山东、陕西、湖南则躬亲之,甘肃、吉林道绝远,则以资界人往。凡为州县五十有一,为里万千百有奇。所振食物及钱折以银为两无虑三五百万,所活之人数亦如之。”

唐锡晋去世后,他的儿子唐宗愈、唐宗郭兄弟全面继承衣钵,成为无锡唐氏东门支中民国时期义赈活动的代表人物。

处于发展上升期的唐子良一支,对于儒家康济胞与的义赈也有着高度的认同。唐锡晋所主持的其他几次义赈,唐子良及其诸子也都曾参与,“江淮之灾,命子明镇躬其事;关陇之旱,命子浩镇董其役。他如豫灾、顺直灾,无赈不与,不求人知亦无有知之而奖及之者。务其实而无为名也。”

这里所提到的唐浩镇,字郭郑,正是唐保谦之长兄。唐宗愈在霸县赈灾之时,曾得到族兄唐浩镇拨济棉衣和粮食鼎力支援。而唐保谦的九丰面粉厂在上海的批发处则成为物资中转站。这从当时他们之间所通电函可见一斑。唐浩镇曾回函唐宗愈称“兄近募得新花新布棉衣万套,计值洋二万八千元。在申日久,费尽心力,督率三百余女工日夕从事,始得此数。”

唐浩镇历官工部郎中、商部郎中、邮传部邮政司司长,1916年任国务院秘书。1921年他死后也因义赈功着获得民国政府准许在原籍建立专祠的殊荣。

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之后,北洋政府于1921年成立全国防灾委员会,唐宗愈、唐宗郭分别担任“主任”“总调查”之职,负责具体事务。在全国防灾委员会成立之后,1923年1月,无锡众知名绅商联合发起成立无锡县溥仁慈善会,“窃维天灾人祸之烈至今日而极矣,盗贼刀兵,所在皆是,水旱疾疫,靡岁不兴,灾害并至,



唐保谦之孙唐骥千、唐骥庭之孙唐翔千在无锡严家桥

劫运难逃。……爰集同志组织溥仁慈善会,专办各种慈善事业。明知博施济众,尧舜犹病,姑就绵力所及次第进行。”该会“以实行慈善事业增进地方公益为宗旨,对于政治概不与问。”该会具名者共57人,唐氏家族唐保谦、唐宗郭等名列其中,在所有姓氏中所占比例最高。

溥仁慈善会的义赈,一直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之时。除了1930年陕州旱灾,1934年溧阳旱灾、1935年济宁和崇明水灾等,都有溥仁慈善会赈灾人员的身影。

在溥仁慈善会中,作为大实业家的唐保谦在钱物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。“无岁不灾,君无岁不赈。吾锡溥仁慈善会爱请君为常务委员,主任其事。君慨然博济,退然不敢居功。”“凡有募施皆出己赀,尤尽心于救荒,自邑里以推之大江南北、楚豫陕直,远而至于黑龙江。蠲助辄巨万。”

唐保谦在家乡办慈善也不遗余力,对饥民施米施粥,对死后无力置棺者施棺,1930年出资建造“梓良桥”,后又筑渠兴水利。他自奉简约,60岁时特地把子孙叫到跟前说“人世间困难贫乏之人这么多,我的意愿是捐自己的有余,瞻人家的不足。”并作出决定:“生勿称庆,死勿靡丧,作为家箴”。70岁时,他把家中准备祝寿的钱全部捐出,用于赈灾,并设立慈善基金,“将岁息之半永作义举”。

庙碑重现旷世善缘

80多年过去了,随着时光的流失,很多人已经忘记了“无锡善人”义赈豫西之举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尘封多年的《陕州召公甘棠庙碑》又重见天光,遂发现了这段旷世的义赈善缘。

陕州民营企业吴启民在出资重建召公祠(今名甘棠苑)时,曾发现一块已经弃之荒地且残破不堪的《陕州召公甘棠庙碑》,并收集到一篇碑文。在与学者一起详加研究后,意外发现碑文的作者和其记载的上世纪30年代重修召公祠和赈灾的人,竟然都是无锡人。于是他立愿重树此碑并挖掘“无锡善人”的事迹。

此事得到了三门峡市、无锡市两地领导、企业家、学者和施赈者后人的大力支持和热烈响应,双方合力互动,你来我往,再续善缘。2014年底三门峡市作家编印出版了《大爱无疆》一书,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赈灾的感人场景。书中刊载了赈灾者后代珍藏的国画《函关赈灾图》,形象反映了无锡善人赈灾义举,民国要人纷纷在画上题词褒扬,给无锡善人极高的评价。国民党元老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手书“河岳声凄夜哭哀、遗黎百万苦成灾,雄关晓日迎秋爽,为报施翁放赈来”的诗题;河南省主席刘峙,作“境称慈父”题字,上方还盖有

红色的省政府大印。

在两地合力互动过程中,无锡的文史研究者也查找到了许多珍贵的义赈史料。例如,唐申伯的积德善举以及唐文治为他撰写的墓志铭。唐申伯为唐子良五子,与大哥唐浩镇、二哥唐保谦及六弟唐纪云都是无锡有名的大善人。1930年陕州、灵宝旱灾,1931年泰州、靖江水灾以及随后的太仓水灾、济宁的旱灾等,他都积极筹措钱物大力救助。而自己布衣素食,十分节俭,常诫家人节约日用以作赈款。每逢腊月岁末,他必微服探访贫苦人家,托词赠送钱物,从不留名。1937年春,他已双目失明,卧病在床,听说1930年赈灾过的陕县又发生奇荒时,非常着急,立即召集家人并组织 and 动员溥仁慈善会、无锡红十字会共同捐款,共为陕县筹到5万元赈灾款。当赈灾者妥善处理陕县之事回锡禀告时,他已奄奄一息,说:“幸闻陕县赈灾告成,我死也可以闭目了。”不久,就告别人世。

“为富贵仁”家风绵长

2015年10月,时任全国政协常委、香港江苏社团会长唐英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忆起祖父与父亲,说的不是“财富故事”,而是爱国爱家济世达仁的“家风家训”。“抗战时期,无锡沦陷。祖父唐君远面对日军刺刀,断然拒绝合作。当日军恐吓要炸掉他创办的协新厂时,祖父坚定地回答:‘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!’”唐英年说:“祖父是条汉子,我以他、也以我父亲为自豪。”唐英年认为家族兴旺有赖于代代相传的优良家风。

唐氏家族是无锡的名门望族。这个“神奇而庞大的家族”,曾走出唐保谦、唐星海父子和唐骥廷、唐君远父子等商界奇才,唐家也因此成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者之一。在无锡近代,唐氏企业集团是仅次于荣氏集团的经营最成功的工商企业集团。唐氏集团在得到大发展后,遵循以儒学道德作为立身行事之本的祖训,奉行“为富贵仁”和“为善多福”的价值观,以“济世达仁”、“富吾富,以及人之富”的家训,在致力发展实业的同时,努力造福桑梓,为民着想,代代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。

唐保谦除了前面说到了的慈善举措外,还热心兴办教育事业,是无锡当时唯一的高等学校国学专修学校的经济董事,出资帮助唐文治先生办好学校。其子唐星海到香港后,继承父志,进一步扩大了捐资兴学。他是香港中文大学创始人,为香港理工大学工作委员会主席,新亚书院董事主席,为创建南海纱厂学校,为纺织学校捐资扩充,为香港大学建造图书馆,在九龙捐建降温系统等,作出了重大的义举。唐骥廷之子唐君远发达后,热心教育事业和其他地方事业,开办丽新职工子弟学校,其子唐翔千在上海设立了唐君远教育基金,与唐宏源一起捐款资助无锡崇安寺小学扩建学舍,出资捐助老年及福利事业。唐君远之弟唐宏源也设了唐宏源奖学金,资助贫困学生。改革开放后,唐宏源、唐翔千等企业家,不间断地斥资资助家乡兴学和地方事业发展。

有道是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。庙碑失而复得,再现了这旷世善缘,致使两地同庆贺,唐氏家族后人兴旺“五世其昌”,更是让人称羡不已。

(据《新锡山报》)